

青少年正面发展视角下的志愿服务

——以一个自发的大学生支教服务小组为例

许英

摘要：以北京一个自发的大学生义务支教服务小组为例，采取质化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一方面，青少年自发的志愿服务对促进青少年的“自信、联系、关爱和个性”等方面的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另一方面，青少年自发的志愿服务也具有经验不足、可持续性差等问题。因此，建议学校等有关部门在鼓励青少年自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同时，给青少年提供相关的和适当的专业指导。

关键词：青少年正面发展；志愿服务；支教

中图分类号：C9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1-0014-06

青少年正面发展(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理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比较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关于生物的发展过程的可塑性的研究(the plasticity of development processes)。^[1-3]20世纪70年代心理学界和生物学界关于基因与环境因素都可以共同应用于解释人类发展的观点，奠定了青少年正面发展的理论基础：由于生物的、个人的和各层次的组织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青少年发展的生态系统，青少年的发展具有潜在的可塑性。^[4-6]这样，虽然青少年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青少年正面发展的视角会把青少年看作一种有待发展的资源，而不是一些需要管理的问题。^[7]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青少年正面发展的概念主要包括以下5项内容(5个“C”)：能力(competence)，自信(confidence)，联系(connection)，关爱(caring)和个性(character)。在这5项内容的基础上，青少年正面发展更加理想的情况是能够达到第6个“C”(contribution)，即对社会作出贡献。^[8]

对于如何实现前5个“C”，不少的教育学家都提出了“从实践中学习”(learning by doing)的观点。例如，皮亚杰(Piaget)反对传统灌输的被动教学方法，认为被动教学法令学生缺少了主动探索、自主建构的经历，并不是获得知识的最优方式，学习“真正的知识”应让学生在环境中“主动观察、透过探索、操作得来”。因而，很多青年研究者和实务专家都认为，促进青少年的正面发展主要应通过各种青年计划(youth programs)来实现。^[9]这些青年计划，既可以是由大型机构或政府来组织的全国性的“公民服务”(civic service)计划，也可以是小型的、青少年自己组织的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活动(volunteer service)。^[10-11]近年来，中国内地大学生各种社团活动已得到逐步发展，内容日趋丰富。^[12] 本文将以一个大学生自发的支教服务小组为例，分析青少年自发的志愿服务对促进青少年正面发展的意义，并尝试提出若干改善建议。

一、研究背景及方法

(一)“志愿服务”的定义

现代汉语里的“志愿服务”是由英文“volunteer service”翻译而来，有时也被译为“志愿工作”“义务工作”或“志工”“义工”等。志愿服务的定义大致有两类：宽泛的“志愿服务”定义，泛指对社会的一种有责任和正面态度的行动方式，且属于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行动；正式的“志愿服务”定义则不但强调“志愿”，而且强调“服务”是有组织的行动。举例来说，某人在公

作者简介：许英，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志愿服务、非营利组织研究。

共汽车上把自己的座位让给老人家的行为，按照第一类的定义，可以看作是一种志愿服务。^[13] 而根据第二类的定义，一个人的“让座”行动并不是“志愿服务”；但如果有人组织一群人义务地倡导和宣传大家给老人家让座，那么这种通过组织开展的义务活动就可以看作是志愿服务。本文采用正式的“志愿服务”定义，换言之，“志愿服务”需要同时满足以下4个条件：1. 参与服务是民众在没有任何强制要求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参与的；2. 参与者不以获取报酬为目的；3. 服务项目的目标是增进社会或人类的福祉；4. 参与者的服务是以组织的形式进行的。

（二）研究背景

一般说来，在理论上，志愿服务活动由于具有公益性，比较容易得到各界的支持。^[14] 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青少年常常被看作是缺乏社会经验、需要保护的對象，因而对于完全由青少年自己来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家长和学校常常会持有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一个偶然的機會，笔者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北京某高校社会工作系三年级的7位同学，经过努力，赢得学校、家长和当地教育局的理解和支持，在没有任何正式组织参与的情况下，自己组织起来利用2011年的寒假去甘肃庆阳县某小学义务教学（简称“支教”）。为此，笔者将之作为研究的案例。组员S这样描述他们开展活动的背景：

“其实这次支教活动不是由哪里组织的。最早我们是申报一个基金会组织去西部支教的项目。但是它是因为涉及到活动经费，最后十个入选了，当时我们排在第11名，被刷下来了。我们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包括那边的小学都已经联系好了，孩子挺期待我们过去的。我们想，没有基金会的支持，我们自己也可以组织，自己出钱，自己去。

……家长当时挺反对的，学院不敢批，学校不许去。但我们也没放弃，最后老师同意了，学校帮我们买了人身保险，还派了一个团委的老师跟我们一块儿去，照顾我们的食宿。

……都到那儿了，县教育局又不批。可能也是出于对当地学生的考虑：那个时候担心有甲型流感爆发的背景，而且那里的学生要来上学，得翻两座山，所以必须住宿在学校，挺麻烦的。……我记得那天下午，教导主任在那边，我们坐在他家一下午，没什么人说话，就在想怎么办。最后，县教育局总算批准了，还资助了我们的餐费。”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质化的研究方法，资料的收集主要是在2012年7月于北京进行的。当时参加服务的7名同学已经大学毕业，其中活动的1位主要组织者已经赴英国留学，其余6位同学分散在各地工作。因此，笔者只联络到2位活动的参加者（S同学和F同学），并对他们进行了面对面地深度访谈。

在访问开始之前，笔者会先向访问对象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是他们的权利，并与他们签署访问同意书。在征得他们同意的前提下，所有的访问都进行录音，并逐字转录。笔者对所有的访问资料进行了匿名编码。

二、研究发现及讨论

（一）志愿服务促进青少年正面发展

不少研究表明，一方面，能够自发地组织或参与志愿服务的人大多是拥有较高能力的人；^[15-16] 另一方面，对青少年来讲，参与志愿服务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他们的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将有助于他们成长为负责任的公民。^[17-19] 我们的研究资料也表明，自发的志愿服务活动，至少在进一步强化青年的自信心（confidence）、增进联系（connection）、发展关爱（caring）的情怀和促进个性（character）成长四个方面，具有正面的意义。

1. 自信 (confidence)

一般说来,能够主动发起、组织志愿服务的青年往往具有较高的自信心,而活动的顺利开展又可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自信。例如,本次受访的自发支教的同学们,虽然他们自己的项目没有得到基金会的支持,但依然坚持按自己的计划去支教,充分显示了他们的自信。例如,S同学表示,虽然他们的项目计划书没有入选,但他们相信他们的准备已经很充分了,可以自己开展支教活动;而且,他认为事实也证明他们的服务是成功的。他说:

“我们还是准备得挺充足的。其实我们也挺感谢基金会的,他们的项目(申请指引)挺正规的:让我们在这个项目计划中,明确上课的形势,而且必须把每堂课的备案,包括教学方案如板书的书写,都要规范。我们课都备好了。

……我感觉到孩子们很喜欢我们。当时招了60个学生,四、五、六年级,一年级两个班差不多60到80人,中途离开就2个到3个,剩下的真的很喜欢,尤其最后走那一天,都哭得不成样。”

2. 联系 (connection)

大型的、常规的志愿服务项目,往往具有比较固定的服务地点,例如,为配合由团中央、教育部联合组织实施的“研究生支教团”,各高校每年都会派遣志愿者去某些既定的贫困地区的小学或中学支教;^[20-21]但自发的志愿服务小组往往要做更多的联络工作,才能开展服务。

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自发支教的同学除了需要联系到愿意接受服务的学校之外,而且至少还需要争取到自己学校的批准,并征得当地教育局的批准才能顺利地在服务地展开服务。服务的参加者S同学认为,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联系成功,除了他们的坚持之外,是由于他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和了解了当地的需求。他说:

“当时(2011年)我们还是学生。我们当时主打的牌之一,是了解他们的需求,我们是按照他们的需求去讲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我们一直在跟学校的教导主任联系,他不仅把他认为的一些需求告诉我们,还组织孩子们拍了照片给我们传过来。”

3. 关爱 (caring)

除了事先了解受支教小学的需求,支教的同学们在到达当地且接触到小学生以后发现学生的期待和教导主任的需求实际上有所不同,于是他们调整了自己的服务方案。他们的言谈和行动都透出了他们对服务地学童的关爱。他们这样说:

F同学:“(教导主任)会把他认为的一些需求告诉我们,但到那里以后,我觉得孩子们的需求、对我们的一种期盼,和老师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会觉得我们是朋友,我们北京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来跟他们玩,然后一块过一个有意思的假期。所以我们后来的一些活动都根据这个有所改变,不光按照我们原先设计的那种方案。”

S同学:“我们准备的挺充足的……但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方案,基本是没有实行的……我记得当时我教的是语文,我的语文课讲义完全改过的,6个晚上不睡觉、熬夜,去了20天熬了6个通宵来备课。”

4. 个性 (character)

已经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个性仍然处于形成的过程中,与同龄的青少年一起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或社会服务,有可能让自己的个性和潜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2-24]例如,S同学表示,他以前并没有

参加过志愿服务活动，但这次支教的经历，让他觉得他以后会喜欢多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他说：

“我家是北京的，基本不怎么住校。像学校组织的社会实践，大家都去，当时我都回家没参加，直到大三这次去甘肃支教，对我是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前两年好多学校活动，我老回家，所以都没参加，觉得特后悔。但以后我都希望自己能课余时间帮助其他人，做志愿服务，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都会希望自己参加这方面的活动。”

（二）自发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1. 责任感还是自我取向？

一些研究显示，与成年人(adults)相比，25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具自我取向(egoistic motives)，如常常出于希望增加工作经验、希望更了解自己等原因去从事和参与志愿性的工作。^[25] 我们研究的这个支教小组的同学，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并没有表现出诸如希望增加自己工作经验等自利动机：他们在没有得到基金会支持的情况下坚持去服务的原因是，已经联系了小学，看到了孩子们的照片，他们不想让那些小学生们失望。但是，由于他们很希望实现自己的承诺，在当地教育部门认为有爆发“甲型流感”的可能性的背景下，坚持说服当地教育部门同意他们开展支教的行动，表明他们的热情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自我取向。

此外，他们自以为准备很充分的服务方案，到了当地之后又根据当地小学生的需要全部重新设计，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学生们热诚和关爱；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在设计初步方案的时候比较缺乏经验。

由此看来，主动、自发地组织志愿服务活动的青少年，可能具有很高的热情和自信，但却有可能因为缺乏经验，对潜在发生的危险和困难有可能估计不足。

2. 缺乏必要的指导

如前所述，义务支教小组的同学虽然没有申请到某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但他们以自己的坚持和努力，赢得了他们就读的大学、服务地的县教育局等多个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最终能够有机会赴自己联系的小学开展支教服务。但在活动中，他们也意识到了缺乏专业指导的问题。例如，S同学认为，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指导，他们的服务会更加成功。他说：

“整个活动是没有老师参与的。有一个团委老师跟我们一块去的，但他只负责我们的食宿，是不会给我们提供专业意见的。

……可能开始我们以为自己设计的方案很不错，但是到那之后，几乎完全都要改。包括一些游戏活动，可能要想其它更适合当地孩子、当地环境的那种活动。……我们是社工系的学生，但没有我们社工专业的老师跟着，没有督导，完全我们自己去开展。当时，我们觉得可能那些专业技巧根本就行不通：我感觉除了最后的分享、归纳，大多数的活动像是做游戏，但孩子们却说‘老师咱别玩这个游戏了，不好玩’。我觉得最起码，如果要让大学生支教更成功的话，得有专业、督导上的支持”。

3. 可持续性贡献

青少年自发组织的志愿服务，由于时间、资金等各方面的限制，往往规模比较小，难以持续，从而对服务地的贡献可能是比较有限的。这个自发支教小组的同学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例如，S同学谈到：

“我觉得我们团队当时刚开始设计的时候，其实是希望是有持续性的，希望它能延续下去。如

果要那种短时期的对一个地方进行支教，其实有的时候虽然可能当时有益处，但是这样只有这么一下子，效果可能并不是很好。我们现在支教回来了，毕业了，但还是希望后续还能跟他们有联系，有一些帮助。我们也希望我们之后还有人去，可是我们下一届的同学似乎对这个项目不太感兴趣”。

三、研究启示

（一）常设活动经费，鼓励青少年自发申报项目

青少年正面发展理论认为，青少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社会应提供更多的让青少年发挥才能或练习技能的机会。^[26] 因此，如果有关部门（如学校、基金会等）能够增加常设的活动经费，并鼓励他们自己提出社会服务方案，将会让更多的青少年有机会从实践中学习和成长。

（二）对青少年自发的志愿服务活动予以适当指导

资料显示，以上几位自发支教的同学，虽然以一名之差没有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但他们还是从基金会的项目申报指引中领会到支教要做的基本准备。尽管不少青少年乐于助人，但相对于中老年人，青少年相对缺乏实践经验，在很多方面仍然需要学习和发展。^[27-28] 因此，正如一位访问对象谈到的，服务的过程中，如果有关的学校或组织能够提供适度专业的指导（如安全知识、教学技巧等），他们的服务效果会更有保障。

（三）本研究的局限和未来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在本次研究中，由于时间、地点等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访问了两位服务参与者，样本量较少，并且没有接触到接受服务的青少年，了解他们的看法和感受，这是本次研究的局限。

实际上，很多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的服务对象是年纪更小的青少年（如大学生去贫困或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支教）。^[29] 在青少年正面发展视角下，我们除了研究志愿服务的过程对志愿者的影响之外，作为受助对象的青少年也应该是被关注的对象。但截至目前，有关志愿服务对受助对象的成长的影响的研究仍然近乎空白。

此外，虽然一些海外的研究已经显示，志愿服务对青少年的未来发展具有正面的意义，^[30-31] 但是截至目前，中国内地还没有长时间的追踪研究。

因此，要更深入地了解志愿服务活动对青少年发展的意义，笔者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机会能对作为志愿者的青少年和作为受助对象的青少年进行长时间的追踪调查。

致谢：笔者诚挚地感谢两位曾经参加支教的志愿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接受笔者的访问！

参考文献：

- [1]Schneirla, T. C.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psychology [M]//In D. B. Harris (Ed.), 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57: 78-108.
- [2]Von Bertalanffy, L. Moder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 [3]Von Bertalanffy, L. General system theory[M]. New York: Braziller Press, 1968.
- [4]Overton, W. F. On the assumptive base of the nature-nurture controversy: Additive versus interactive conceptions[J].Human Development, 1973 (16) : 74-89.
- [5]Lerner, R. M. Nature, nurture and dynamic interactions[J].Human Development, 1978 (21) : 1-20.

- [6][8]Silbereisen, R. K. & Lerner, R. M. Approaches to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A View of the Issues[M]//Silbereisen, & Lerner (Eds.). Approaches to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3-30.
- [7][11]Roth, J. L. & Brooks-Gunn, J. What is a youth development program? Identification and defining principles[M]//In F. Jacobs, D. Wertlieb, & R. M. Lerner. Enhancing the life chances of youth and families: contributions of programs, Policies, and service system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197-223.
- [9]Piaget, J.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M] translated by Margaret Cook,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4.
- [10]Benson, P. L. Adolescent development in social and community context: A program of research[J]. New Directions for Youth Development, 2002 (95) : 123-147.
- [12]杨凤娟. 高校学生社团组织与大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05, 15 (1) : 50-51.
- [13]丁元竹. 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现状与问题[J]. 志愿服务论坛, 2001 (1) : 5-11.
- [14]Xu, Y. & Ngai N. Moral Resources and Political Capital: Theor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luntary Service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11, 40 (2) : 247 - 69.
- [15]Katz, A. H. Self-Help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eer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welfare[J]. Social Work, 1970, 15 (1) : 51-60.
- [16]Wilson, J. & Musick, M. A. Work and Volunteering: The Long Arm of the Job[J]. Social Forces , 1997, 76 (1) : 251-272.
- [17][22][26]Benson, P. L. Developmental Assets: An Overview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M]//Silbereisen, & Lerner (Eds.). Approaches to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2007: 33-58.
- [18][23]魏雁滨, 张宙桥. 香港青少年从个人层次到社会层次的发展指针[M]//王志鸿, 姚伟兰. 两岸四地青年发展指标研讨会论文集. 澳门: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 2004: 59-77.
- [19][24][31]Ngai, S. S. Service-learning,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mmitment: A cas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J]. Adolescence, 2006, 41 (161) : 165-175.
- [20]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03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2003]49号) [RB/OL]. [2013-09-20]. http://info.jyb.cn/jyzck/200604/t20060402_14088.html.
- [21]薛向东.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高教版, 2009, 14 (11) : 3-4.
- [25]Nylund, M. Mixed Motives of Young Nordic Volunteers[M]//Helena Helve & Claire Wallace (eds.) Youth, Citizenship and Empowerment. UK: Ashgate Publishing, 2001: 91-109.
- [27]Jeal, T. Baden-Powel[M]. London: Hutchinson, 1989.
- [28]Brudney, J. L. & Kellough J. E. Volunteers in Stat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Management, and Benefits[J].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0, 29 (1) : 111 - 130.
- [29]余辉, 马燕萍. 大学生西部计划实施效果调查与问题分析[J].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0, 32 (4) : 108-110.
- [30]McFarland, D. A. & Thomas, R. J. Bowling Young: How Youth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fluence Adul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6 (71) : 401-425.

(责任编辑: 李春丽)